



说

中  
国

哲学 朱学勤

俞吾金

高瑞泉

史学

葛剑雄

周振鹤

姚大力

文学

骆玉明

杨扬

江西教育出版社

学

说

中

国



江西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说中国/骆玉明等著,一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3

ISBN 7-5392-3226-9

I.学… II.骆… III.人文科学-研究-文集

IV.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9779 号

## 学说中国

骆玉明 杨 扬 葛剑雄 周振鹤

姚大力 朱学勤 俞吾金 高瑞泉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URL:<http://www.jxeph.com>

(南昌市老贡院 8 号 330003)

江西科佳图书印装有限公司印刷装订

(南昌市洪城路 636 号 330009)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开本:32 印张:10.25

字数:238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92-3226-9/Z·63 定价 18.00 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调换

## 前 言

继“京派”《学问中国》之后，我们又特别邀请了八位沪上著名学者，分别从各自专业领域表达了他们在建设新一代中国的思想学术时所思考的部分重要问题和各自富有创造性的观点，做成了这本《学问中国》的姊妹篇——《学说中国》。我们企望集结京海两地优秀学者的富有代表性的思考，来描述一个相对准确的中国当代学术思想概貌，同时借此告诉广大读者在学者们眼中的中国问题是如何一番风景。所不同的是，此书的各位作者全部集中在文史哲人文学术范围内，故更关注于中国当下的人文现状和与人文相关涉的物质现实。他们的思考或许不是权威的论断，但无疑对于中国如何以新的姿态迈向新世纪，提供了一种比较能科学发展的可能性。

目  
录

## 一 双重旋律的人生乐章

——中国文学中道德主旨与情感

欲求的纠结 \ 骆玉明 (1)

一、引言:美与善之间 (2)

二、“露才扬己”的依托 (5)

三、色——趋退之态 (16)

四、前述问题在通俗文学中的变化 (28)

五、结语 (39)

## 二 尝试的陌生化与陌生的尝试

——认同差异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空间的拓展 \ 杨 扬 (42)

一、作为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问题 (45)

二、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进行的学科调整 (54)

三、生成之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66)

## 三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

余论 \ 葛剑雄 (81)

- 一、中国历史上究竟是统一的时间长，  
还是分裂的时间长？ (84)
- 二、统一的范围越大越好吗？ (97)
- 三、怎样理解“自古以来就是中国  
的领土”？ (110)
- 四、超越传统，走出轮回 (118)

#### 四 外重内轻还是内重外轻？

——中央地方关系变迁

研究 \ 周振鹤 (126)

- 一、引言 (127)
- 二、历代中央地方关系变迁过程 (129)
- 三、对历代中央地方关系变迁的阐释  
(148)
- 四、建国以来中央地方关系的变迁 (151)
- 五、结语 (161)

#### 五 历史学失去

魅力了吗？ \ 姚大力 (168)

- 一、“史学危机”及其回应 (169)
- 二、他山之石 (179)
- 三、前世业障 (184)
- 四、“灰色”历史与新实证研究 (190)

#### 六 一九九八年自由主义

学理的言说 \ 朱学勤 (202)

- 一、首先是自由，然后是主义 (203)
- 二、新左派的批评 (212)

三、自由主义的讨论和应对 (217)

四、自由主义的难局及“手”“足”之争  
(220)

---

## 七 工艺理性批判 \ 俞吾金 (225)

---

一、理性批判的类型分析 (227)

二、工艺理性的含义及其基本特征 (235)

三、工艺理性的界限 (267)

---

## 八 走出后经学时代 \ 高瑞泉 (279)

---

一、楔 子 (280)

二、后经学时代的来临 (281)

三、后经学时代的价值状况 (284)

四、传统价值系统的结构性特点 (286)

五、新观念的潜滋默运 (292)

六、民族价值重建的历程 (295)

七、走出后经学时代 (308)

# 1

## 双重旋律的人生乐章

——中国文学中道德主旨与情感欲求的纠结



**骆玉明**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有《中国文学史》(与章培恒共同主编)、《徐文长评传》(与贺圣遂合作)、《纵放悲歌》、《老庄哲学随谈》诸书,及各类文章若干。



## 五 结语

## 的变化

## 四 前述问题在通俗文学中

## 三色——趋退之态

## 二「露才扬己」的依托

## 一 引言：美与善之间

## 一、引言：美与善之间

很有些文艺理论家或美学家诚恳地告诉我们，文艺所追求的境界是“真、善、美的统一”。这话听上去，让人觉得像是基督教义中的神圣的“三位一体”说。这也不完全是由“三”引起的联想吧，那里面确实是有点宗教气息的：人类生活中诸项基本价值的圆满和谐，应该是天堂里的事情。

近代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思想理论，公认是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这两者有一个强烈的共同点，就是否认道德的抽象意义和绝对性（尽管其依据有所不同）。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和弗洛伊德都认为，人类行为的出发点，并不是道德意义上的“善”，而是人的欲望和利益需要。譬如在《神圣家族》中，马、恩引用并肯定了爱尔维修所说“人并不邪恶，但却是服从于自己的利益的”<sup>①</sup>；弗洛伊德谈“人生的目的”，则认为它“主

要还是由享乐原则决定的”<sup>②</sup>。通过对人类早期社会的研究，弗洛伊德证明了：凡为道德所禁止的，就是人本来想要的。而且，即使在文明时代，道德也往往是指向人的欲求的强制力量。而马克思则通过阐述黑格尔哲学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sup>③</sup>他们都深刻地注意到道德规则与人的内在欲求并不总是和谐相处的，在许多情况下其实是彼此冲突的。

本文无意就文艺和伦理学的理论问题作过多讨论，只是想说明一点：作为艺术评判的“美”和作为道德评判的“善”，其性质完全不同。文艺的直接根源是人的情感，它体现生命的本真状态，在自然的情况下，是一种极为活跃和个人化的东西；而伦理道德则是理性的规则，它为情感欲求划出具体社会条件下所允许的范围，以各种高尚的名义指导人的行为；它至少在必须的程度上是社会公认的和稳定的，如此人们才能依据它来确认行为的是与非、当或不当。主张“美”与“善”相统一，其实通常是把文艺的裁判权归属于道德的裁判权，如S·汉普夏尔所说：“在说教成风的环境中，总是有人根据类比，要求有一种与行为原则并行不悖的批评原则。”<sup>④</sup>而内中缘由，是“善”通常表现社会主导力量的意志。

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美”与“善”之间存在着的可以称为“动态平衡”的有趣关系。所谓“善”，其实只是一种判断，并不存在绝对不变的内涵，它总是和一定的时代与地域条件相联系。一方面，它的规则必须有相对的稳定性，因为这牵涉到既存社会秩序的稳定；另一方面，它也必须对人类生活中某些根本的要求保持弹性，对生活的重大变化作出回应，否则其自身存在的理由将变得虚妄。也就是说，某些被判定为“不善”的东西，只要不公然冒犯道德规则，也可以以变形的状态存在；当它渐渐成为人们的普遍要求时，“善”的规则又必须为之

改变。而从文学这一面来看,在人的情感中自然存在的东西,若是与社会的尚处稳定状态的道德规则相冲突,它就很难得到自由的、坦然的表现;也就是说它因为是非“善”的,所以也不容易被认为是“美”的。但若是这种情感是人性中不可能被消除的强烈的存在,它就一定会要求得到表现、得到承认,哪怕是通过曲折的途径。世上的事物,并不只是存在单一的合理性。在道德意义上合理的东西,就人的情感欲求的指向而言,可能是极不合理的;就情感欲求、就人的自由本性而言是合理的东西,在具体社会条件下,如果不受到道德规则的制约,很可能具有极大的危害性。这种两难处境,其实是人类文化中永久的问题。而文学作为虚构空间,既为人的情感、人性欲求提供了较实际生活环境更为广大和自由的演示场所,也由此对存在于实际生活环境的种种制约是否具有真正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优秀的文学虽不给出明确的疗治社会疾患的方案,却经常在揭示人性的困境,揭示人性欲求与现存社会规制——包括“善”的规则——的矛盾,要求社会不是凝固于道德,而是按人性化的方向转变,由此成为人类创造自身生活的方式。

以上所述,当然不只是中国文学的问题,但中国文学在这方面的问题,可以说格外值得注意。众所周知,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特别注重伦理对其成员的约制作用,习惯于把道德教化视为将社会引导至理想状态的根本力量。譬如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的人很容易注意到:中国的神话人物较之古希腊、罗马神话人物,其道德色彩要强得多。黄帝、尧、舜,在最初的传说里也有凶狠狡诈的表现,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十大经》中记黄帝擒蚩尤后对他的处置,就是极其残酷的。但在儒家文化体系中,他们渐渐变成具有完美德行的圣贤;传说中由他们统治的上古时代,也成为德性得到充分实现的理想社会。

这种对历史与政治的道德化描写,包含着以道德融化人欲的深长意味。但这绝不表明中国古代人们的生活是枯涩的、情趣是平淡的,只是它表现出来的形态要多一些曲折、多一些微妙之处。以文学中的情况而言,即包含着伦理掩饰,道德主旨与情感欲求的相互克制、彼此均衡等种种现象。而中国文学与伦理意识的关系,虽然在一般的文学研究中不免有所涉及,但很少有人对之作系统的讨论,所以笔者觉得这是很值得一说的话题。

不过这话题实是过于庞大,若想说得充分,写成一本书恐怕也要很厚才够,如今在一篇文章中处理,便不能不有所简化。所以下文将把问题集中在两个基本要点上,且常常仅是取某些例证来讨论。在讨论中,似有一种时间的顺序,但这主要是为了说明有关问题的变化情况,实际上也是举例性的,并无多少“史”的意识贯穿在里面。——这是本文所无力承担的。

## 二、“露才扬己”的依托

《孟子》中说:“食色,性也。”这是指明了人性的最基本的内容。但所谓“仁人志士”所求,当然有逾于此,孔子有云:“四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子罕》)他觉得人活到四五十岁还不出名,是可怕的事情;那么老夫子一生栖栖遑遑,也不完全是因为忧虑道之不行吧。而司马迁自述其“所以隐忍苟活”以完成《史记》的著作,是惟恐“鄙陋没世”,名无所立(《报任少卿书》)。人在世间曾有过的生存,是很容易消散无踪的;至于有生之年即面临失败的处境,更是提前和更刺激地看到了生命价值的取消。许多学者认为,显露自己的生命,使个人所具有的才能得到实现,是人性的本性需要中一

个重要的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也持同样的看法（见《神圣家族》），我想这是很容易体会到的事实。那么，人对于否定和取消自我的力量（尤其是来自社会的）的否定，应该是一种强烈的要求，必然会成为文学的重要内容。

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在这方面有突出表现的，是伟大的诗人屈原。

由于受狭隘的“反映论”的影响，加上中国固有的以文学证明史实的习惯，过去人们研究一部作品，总是首先将之还原为作者的传记资料；若是其中涉及社会政治方面的问题，便用它来解释有关的历史事实。这样做也许是有必要的；但，如果简单地将文学作品作为史料来使用，则必然存在很多危险。即以屈原的作品而论，我们看到作者和他的政敌的对立，而正在发言的是作者，另一方已经从历史中消失得无甚踪迹了。我们可以完全根据一方的发言来定相反一方的罪名吗？再则，文学——尤其诗歌——并不是讨论政治问题的合适场所。屈原在其作品中表示要坚持的那些政治主张，诸如要求效法尧、舜，不要走纣、桀的荒淫放荡之路，以及要求修明法度、任用贤能等等，都是那个时代普遍公认的原则，我们能够相信他的政敌是持相反意见的吗？——如果是，那倒很有意思了。当然，这样说并非为了讨论屈原所言可信程度的高低（尽管文学总是包含“谎言”成分的），只不过指出这是屈原选择的表达方法。至于实际发生过的政治斗争，应该有比这些简明的言辞复杂得多的内容；而历史，实在也不能解释为君子（“好人”）与小人（“坏人”）斗争的过程。

屈原作品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在于他表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人生姿态。

至少，以屈原的自述即他的自我感觉来看，他和楚国整个统治集团处在了对立的地位上；他的失败，不仅表现为他的政

治主张不被采纳,他失去了重要的政治地位,而且表现为他在道义上、人格上遭到了他所属的社会群体的否定(《离骚》所谓“谣诼谓余以善淫”);他不仅被他曾信任的人们所抛弃,而且感觉到在整个楚国,他都是孤立无助的。这一切,无疑会构成巨大的精神压力。

然而,面对这样的压力,屈原采取何种态度呢?直接而激烈地,他对这个否定他的世界提出否定:君主是昏庸而容易受骗的,“党人”是卑鄙而险恶的,连一般楚国人也被作者不无蔑视地称为“南夷”。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都呈现昏乱的景象。而相反的一面,是作者热情的自我歌颂和自我夸饰:从血统的高贵、生辰的吉祥、名字的美好、装饰的芳洁,到品质的忠贞、才能的出众、意志的坚强,一直到以死来表达的操守的高洁特立。我们完全可以说:以《离骚》为中心,屈原以文字对其被否定的人格形象进行了自我重建;文学作为特殊的精神生存空间的价值,在这里第一次得到充分的体现。

就屈原作品所体现的作者的品格问题,汉代曾发生过争论。先是淮南王刘安受武帝之命作《离骚传》(“传”或作“傅”),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皜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sup>⑤</sup>司马迁作《史记》,又将这一崇高的评价引用在屈原的传记中。而后东汉班固作《离骚序》,却认为这一评价是过分的,他认为屈原“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怆不容,沉江而死”,“非明智之器”。所可取的,只是在文章“弘博丽雅”。继而王逸作《楚辞章句》,又对班固的指责加以反驳,强调《离骚》诸作,合于“诗人之义”(即《诗经》的宗旨)。一直到刘勰作《文心雕龙·辨骚》篇,还在喋喋不休地分析屈原之作“同于风雅”的是什么,“异乎经典”的又在哪里。可以说,关于屈原,发生了

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重大争论；而争论的焦点，是在屈原作品的精神是否符合儒家经典的要求。

如果把屈原作品与《诗经》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显著的区别。“温柔敦厚，诗之教也。”孔子如是说。现代研究者有对此表示反对意见的，理由是《诗经》中也有情绪激烈的作品。但再深一步看就可以知道，《诗经》中表现得激烈的情绪，几乎无例外都是指向第三者的：“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昊天！”（《巷伯》）在这同时，作者自身的形象并不凸现出来，这实际意味着：诗中的对立，并非某个具体个人与被攻击者的对立，而是“公理”、“正义”与“无仪”者“谮人”之间的对立。而《离骚》等作的情况就不是这样，它的热情的语言首先指向作者自身：《离骚》开头和结束句子的主语都是我（“朕”、“吾”），自我歌颂构成了它的中心线索。而作者与“党人”乃至整个楚国人的对立得到有力的彰扬。所以，班固说屈原“露才扬己”，实在并没怎么错。

问题是，单纯的“露才扬己”不是那个时代的道德规则所能够允许的行为，相应的，作者也会缺乏这样做的自信。因此，像屈原那样强烈的自我歌颂和自我夸饰，必须有伦理意义上的依据。于是，我们看到《离骚》等作品中的人物关系，形成了一种颇具戏剧意味的结构。

在《离骚》中，作者自我的形象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的德性和智慧，都处于一切人之上；另一方面，他又是极端忠诚于君主和君主所象征的国家的，他的价值、他的生存的意义，依附于君国而存在。他既自豪地把自己放在君主的导师的地位上（“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又很谦卑地表示愿意“屈心而抑志，忍尤而攘诟”。王逸注谓其“优游婉顺”，便是指这一种态度而言。这样，作品中的自我歌颂乃至自我夸饰

就有了符合一般道德规则的前提。

而诗中君主的形象被作了微妙的处理：他既是至高无上的，本质上当然是“善”的，但在诗歌描述的事件中，却是被蒙骗而偏向于邪恶的，因此成为作者蒙难的关键原因——“荃不察余之中正兮，反信谗而齎怒。”王逸注说：“荃，香草，以喻君也。人君被服芳香，故以香草为喻。恶数指斥尊者，故变言荃也。”这是很体察了作者的一番苦心。这样处理的结果，使得作者的忠贞有了可以依托的对象，且因为这对对象并不理解作者的忠贞，而使得这“忠贞”愈发具有悲剧色彩。“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灵修”也是对君主的美称）此类表述，在屈原笔下反复出现。现代对屈原作品的真实性表示怀疑的研究者，曾提出这样的意见：在战国时代，国君并不具有后世皇帝那样极端化的个人权威，上层社会中的忠君意识也并不像后代那样强烈，屈原作品的上述特点，与时代气氛不合。但也许可以说，正是因为屈原作品中存在强烈的自我歌颂，因此需要相应加强其忠于君国的表白，这样才能达到必须的平衡。换言之，一个道德主旨的强化，可以借以容纳更多的非道德内容。

至于作者在政治上的对手，则完全被描绘为道德意义上的邪恶者；换言之，作者把他和政治对手的对立，完全转化为道德意义上的对立。这也使作品中的自我歌颂和对美德的歌颂成为一体。

也许，屈原确实相信他所描述的是真实的情形，但那是另一回事；就作品论作品，这种描述乃是自我歌颂得已成立的条件，所以，对于愿意从儒家道德原则出发为屈原辩护的人，屈原也并非没有为之提供依据。实际上，怎样看待屈原，跟个人的思想、性格大有关系。刘安、司马迁都有不安分的地方，班固在维护正统道德信条方面具有热情，而刘勰总是喜欢说些



折衷而“圆通”的话。

如前所言,表现自我的生命力,使自身具有的才能获得实际的成功,这是人的本性需要。但在中国古代,文人争取这种成功的场所很有限,几乎集中于政治领域。而政治却是群体性很强的活动,人的个性在这里极易遭到抹杀。大体可以说,自我意识愈强的人,在政治中遭受失败的可能性愈大。就以屈原而言,大概也是如此情形吧。《史记》的屈原传中记述上官大夫在楚怀王面前进谗言,谓:“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怀王遂“怒而疏屈平”。这谗言的收效如此轻易,总不会没有屈原自身的原因。然而屈原作为政治家的失败,却成为他作为诗人获得绝大成功的契机。因为,政治失败使得个人价值遭到彻底抹杀的危机尖锐地凸现出来,使生命的存在面对巨大的虚无,而文学在这时成为几乎是唯一的自我解救途径。通过对否定自我的力量的否定,通过自我人格形象的重建,屈原那自尊的心灵获得了支撑。而由于作者所要表达的感情异乎寻常地激烈,需要顾及的因素又相当复杂,若使用简单的文体就会很不充分。“骚体”这一种华丽而宏大的文体被创建出来,当然牵涉到作者的文学才华问题;但我相信,它首先出于作者情感表达的需要。在这里,首先是自我的扩张,促成了文体的扩张。

一种文学作品的流传情况,与读者的需求,关系最为密切。以我看来,阅读行为从根本上说主要不是对作者情感的了解,而是读者对自身情感的验证。在阅读中,什么东西令我们快乐,什么东西令我们悲哀,我们由此确认了自己。屈原作品最初的流传,据王逸《离骚经章句叙》说,是“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这里显然有楚人悯惜其故国败亡,并将之与屈原的失败相联系的心情。而到了西汉,其存在与受重视的背景又有很大不同。秦汉以来君权的强化,使得文化